

孫逸仙先生與臺灣

陳嘉猷

始終關切臺灣光復

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名文，字載之，號逸仙。生於中國，壯遊世界，博古通今，畢生革命；他是臺灣光復之母，是世界大同之光。不僅是一位革命家，且為救國救世的大政治家、大思想家。他發明的三民主義，既是建國、復國的法寶，又為反共、救世的要道。一方面艱辛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，同時要謀全球永久和平大同世界的實現。吳經熊說他是：「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巨人」；美國林百克贊譽他為「世界之大師傅也，人間之活上帝也。」值得舉世所景仰。

茲值孫先生逝世五十八週年紀念，特就他與臺灣及世界的關係，作簡要介紹，以求正於中外雜誌讀者。

臺灣與大陸脈相連，骨肉一體，就血統、文化、語言、風俗、地理環境與歷史淵源來說，都是休戚相關，榮辱與共的。只是臺灣同胞，在歷五十餘年日據時期，「政治受歧視，生活上被奴役，經濟上遭剝削，教育上無平等」（先總統蔣中正語）。像日據時代，臺胞無一擔任官，薦

任者僅杜聰明一人而已；又如嚴刑峻法的「六三法案」，消滅民族意識的「皇民運動」等，受盡虐待，苦不堪言！國父為救國救民，畢生奮鬥，對臺灣的生活，始終關切；而如何使臺灣早日光復？重獲自由，正是孫先生生前的宿願！

臺灣的根源於大陸

從史實看，據後漢書東夷傳臺灣為漢時的瀛州，澎湖是古代的方壺。也就是說臺、澎兩地，在漢代已有了宗主權。除了十七世紀初與十九世紀末，各為荷蘭與日本侵佔四、五十年以外，遠在隋初時，即正式歸入我國的版圖了。在民元前，一三〇二年，隋煬帝首先經略，至元列入圖內，宋、元、明三代，移民殖種者多了。清光緒二十年起，建立為我國的一省。

鄭成功在復臺詩中，有「復臺荆棘逐荷夷，十年始克復先基」而對荷蘭人說：「臺灣者，中國之土地也。」連雅堂著「臺灣通史」大聲疾呼：「臺灣之人，中國之人也」；又說：「我祖我宗，橫大海、入荒陬、臨危禦難，以長殖此土。」這方豪讚歎此語：「真可驚天動地而泣鬼神。」這

更可見：本地臺灣人，實在都是忠貞的大陸人。

十六世紀，葡萄牙人鑑于臺灣的山明水秀，好像海中翡翠，叫它「FORMOSA」，葡語的意思是「寶島之珠」。由地緣看：臺灣與大陸，同一血緣，以姓氏源流考，證明臺灣同胞來自中原。就西臺發現的象、犀牛、野鹿等大型哺乳動物的化石研究，在百萬年前，大陸與臺灣是連在一起的；真是滄海桑田，變幻莫測。而且，目前臺灣海峽的地壳，已由滑動、安靜，而微有上升，據專家推測，十萬年內又將連接一起了。

可見，臺灣與大陸的關係，大陸是本，大陸乃臺灣之根，「本固枝榮」，「血濃于水」，這是無法分割的。從反清復明運動的基地說，自鄭成功開關歸入中國版圖三百年來，充滿着民族主義的氣息；今天反共復國的基地，更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。

簡括來說，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地緣、血緣及人文關係，自始一體，它與整個中華民族，歷史文化的血肉，密切不可分離。如此鐵證，竟然尚有一小撮數典忘祖喪心病狂者，喊出臺灣不是中國的，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謬說，那不是幼稚無

知，便是想出賣民族國家的漢奸論調而已！

國父主張恢復臺灣

臺灣是「一島基一國之富強」（劉銘傳語）；也為「我們中國大陸東方唯一的門戶，東海與南洋島嶼中間的鎖鑰，而在亞洲東南諸島裏面氣候最為適中，物產也最稱豐富」（蔣中正語）；且是西太平洋的樞紐，「不沉的航空母艦」（麥克阿瑟語）。其重要性，自可想見。

國父孫先生為要光復臺灣，先後蒞臺四次。在他自撰的「中國革命史」中，開頭便說：「余自乙酉中法戰後，始有志于革命，乙未遂舉事于廣州，……」。中法戰役，起于民元前二十八年（一八八四年），那年十月法軍便進攻臺灣；及甲午中日之戰，臺灣慘遭割據，這尤使國父為救臺救國而奮鬥不懈！國父與臺灣的關係，實在太密切了。

我們看甲午中日之戰，發生于民元前十八年（一八九四年）七月二十五日，八月一日正式宣戰，清廷一敗塗地，令人切齒痛恨！隔了四個月，即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。國父就領導革命，首先創立「興中會」。第二年四月十七日，滿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「馬關條約」，臺灣被迫割讓予日本。由于臺灣同胞的抗拒，日軍于五月二十五日在淡水進兵，武力接管，在步步為營血肉死拚下，直至十月二十一日臺南失守，于「哭聲震天」中全臺便告淪亡！

自馬關條約簽定後的六個月零九天，即十月二十六日（重陽節），國父毅然匆促發動第一次

的「廣州起義」；這個日子，也正是全臺被日軍血塵佔領後的第五天。所以，興中會的神速發展，國民革命的蓬勃推進，顯然由于「蒙耻啓羞，割地求和」（孫文語），滿清戰敗割臺的刺激所促成。

當民元前十八年，朝鮮方失，臺灣剛割；一八九六年，國父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，就提出「恢復臺灣，鞏固中華」；在興中會活動時，又曾提出「恢復高臺，鞏固中華」之口號，高指高麗（朝鮮，即今之韓國），臺即臺灣；務使高、臺能獨立自由，始可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，奠定東亞永久的和平。可見光復臺灣，早為國父革命的策略目標之一，甚至一直到他臨終時，依然念念不忘臺灣同胞的早復自由。

在興中會時期，有過廣州與惠州的兩次起義；就惠州起義來分析，更與臺灣密切有關。當民元前十五及十四年，國父派陳少白兩度來臺，不但為在臺的興中會（第二）分會樹立基礎，也替惠州起義國父親自來臺指揮作了鋪路工作。庚子年，八國聯軍禍起，慈禧及光緒帝出走，南部總督李鴻章允獨立，國父自稱：「余以時機不可失，乃命鄭士良入惠州，招集同志，以謀發動。」國父本人呢？便于惠州起義（十月八日）前五星期，即九月二日，親自來臺策畫與坐鎮指揮。不幸天有不測風雲，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因日本內閣伊藤博文接任，態度遽變，臺督兒玉源太郎，也跟着惡化；兼以非之存日軍械落空，影響濟助，雖有十月二十五日臺援奮勇助攻，終因眾寡懸殊，仍告失敗。而臺灣因國父之來，成為惠州起

義的指揮基地，乃永為革命史上無比光輝的一頁。

先總統蔣公曾說：「我們國父創導革命，即以光復臺灣為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。」國父逝世後，復由蔣公繼續領導國民革命，亦無不以收復臺灣為己任，經八年對日浴血抗戰，犧牲奮鬥，終于使臺灣重回祖國懷抱，更成為反共復國的基地。正如黃季陸先生所說：「中國革命，是臺灣光復的因；臺灣光復，是中國革命的果。」

國父四次蒞臺經過

國父究竟蒞臺幾次？說法不一，黃季陸先生說來臺三次；方豪先生的考證和推測，謂有七次之多。惟據筆者依據「國父年表」資料等綜合研究，認為以四次比較可信。

在民元前十二年、民國二年、民國七年及民國十三年四次比較中，以第一次在臺最久，第二、三次為時甚短，第四次只是在輪船停泊基隆港一宵。茲分別作簡要說明如下。

按「國父年表」時間，國父第一次蒞臺，是在民元前十二年（一九〇〇年）九月二日（陰曆八月初九日）。這時，清廷正遭義和團之變，國父由上海乘臺南丸抵基隆而臺北，設立革命總司令部，坐鎮策畫並指揮惠州起義。旋因日本政局波動，臺督態度轉變，國父迫于無奈，于十一月十六日變名「吳仲」，乘橫濱丸自基隆出帆離臺。此行，來臺住址與離臺時間，縱有多種不同說法，但不難證實，最少住居一個月以上（詳請參見拙著「國父思想的研究」第三章）。

國父第二次蒞臺，按「年表」資料，謂于民國二年十一月杪（三十日），自上海經福州來到臺北，而于十二月初即轉赴日本。但由筆者研究，應該是在民國二年八月五日才對。那年七月間，在滬的二次討袁革命失敗，國父爲謀再舉，曾派黃興赴粵準備；八月二日，偕胡漢民、戴季陶等離滬赴粵途中，在馬尾獲悉廣東情況緊急，都督陳炯明部受賄譁變，袁世凱另派龍濟光接替。國父受日本參謀本部派駐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的密勸力勸，便坐撫順丸于八月四日晨啓航，于八月五日晨六時安抵基隆港。

那次，由日督派人迎迓，安排至臺北御成町梅屋敷休息。該址，即今之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四十六號。屋主爲表欽敬國父之忱，特移贈政府，旋改名爲「國父史蹟紀念館」。民國四十三年建黨六十週年紀念時，先總統蔣公親自題字勒石兩句名言：「匡復中華的起點，重建民國的基地」；益增該館的意義與國父蒞臺的重要性。

雖然，那時適逢當地抗日革命風潮澎湃，臺灣愛國志士賴來、沈阿榮、張火爐、李阿齊等分別在臺灣中、南部發動革命；羅福星的光復臺灣運動，亦在苗栗熱烈推進；以致在日警嚴防密偵下，使國父此行神秘隔離，僅翁俊明、周水牛諸人，趁機謁見國父，民間知者不多，而感受革命精神已有極大的鼓舞。當日下午，國父由基隆乘信濃丸化名離臺，九日抵達日本神戶。臺灣光復後，日人藤井悟一郎曾來臺詳告國父此次蒞臺經過，並將國父當時揮毫的「博愛」與「同仁」兩幅墨寶，于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間，隆重呈獻中

央黨部，刻虔藏于國父紀念館。

國父第三次蒞臺，是在民國七年五月三十一日。他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務以後，離粵經汕頭，取道臺北，勾留一日後，經日本赴上海（「蔣總統秘錄」第五章）。

這次蒞臺的用意，據戴季陶先生于民國十六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籍同學的講詞：「民國七年，我們的總理孫先生，因爲在廣州革命失敗，離開了廣州，第一步先到汕頭，然後經臺灣轉赴日本。這時，我們的總理有一個計畫，就是到臺灣，想和臺灣同胞見面，發表他的意見，宣傳他的主義，喚起民族意識，鼓舞愛國精神。」又說：「我們的總理抵達臺灣的時候，臺灣同胞非常高興，很想要表示熱烈的歡迎，可是日政府與臺灣總督府，拒絕總理和臺灣同胞接近，……。」雖然因日本當局的阻隔，殊少與愛國志士晤談，但國父對臺灣關切的心情，不難想見！

北上議和道經基隆

國父第四次蒞臺，是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那時國父五十九歲，想以人格感召，統一全國，特不顧一切，冒險北上議和，經由上海繞道日本赴天津途中，船在基隆停泊了一夜。國父深知日本當局既怕他來臺，便也不再提出上岸遊覽的要求；第二天就匆匆偕同胡漢民、戴季陶先生等離開了臺灣。

關於這件事，戴季陶先生曾作側面而精透的解釋。他提到日本中有板垣退助其人者，在民國四、五年間，基于人道立場，發起「臺灣同化

會」的組織，想藉以伸張民權，使臺灣人獲得一點起碼的自由，而板垣竟被日本政府趕走！因此，戴先生認爲「臺灣日據時代，對這溫和主張，尚且不能容許，那裏肯給臺灣人與中國國民黨的革命領袖聚談的機會」。並說：「日政府的政策，是意圖使臺灣同胞永久不受革命思想的刺激，而永爲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愚民。」（「臺灣省通志」卷九，革命志，抗日篇，第六章）。可見，臺灣光復，多麼艱難與神聖！

總之，臺灣與大陸血肉相連，國父始終關切着臺灣的福祉。當國父與世長辭時，在北京大學的臺籍學生，以北大臺灣同學會名義，致送了一副血淚感人的輓聯：「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，微先生何人領導？四十年祖國未竟志業，舍我輩其誰分擔！」十足證明臺灣與大陸一體，臺灣革命與大陸革命的合流。

戴季陶先生撰述「孫中山先生與臺灣」一文內，他說到國父的重視臺灣：「臺灣的民衆是中國的民衆，臺灣民衆的團結，就是中國民衆的力量，臺灣民衆愛國的熱忱，確是民衆革命精神的表現」。又說：國父于逝世臨終之前，尚提到「對日本應該主張的問題，最少限度有二項：一是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；二是使臺灣和高麗最低限度獲得自由」。幸賴先總統蔣公領導抗日，贏取勝利，終于達成國父的宿願，使淪陷了五十年零一百九十年的臺灣寶島，光榮地于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，重回祖國的懷抱！也結束了中國次殖民地時代！但「毋忘在莒」，我們更該上下一心，團結反共，以光復臺

灣的精神，早日完成光復大陸的革命志業。

全世界的偉大人物

西哲蘇格拉底(Socrates)的一句名言：「怎樣認識你自己？」在哲學理念上，深植世人的惕勉！孫子兵法云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」；事實上知彼難，知己亦不易。我們爲崇敬國父，效法並弘揚其言行，應先由認識與瞭解着手。

國父愛國若命，人格高超，大公無私，度量寬宏，且爲反共的先知。傳記逾六百種（參見拙著「國父思想的研究」第二四四頁），被譽世所景仰。中庸：「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，行而世爲天下法，言而世爲天下則」，足以說明國父的偉大。日人宮崎龍介說國父「不但爲中國一國之偉人，實爲全世界之偉人」。他的言行，足供世界人們的楷模。

這裡謹就國人對國父的景仰、來作、扼要的敘述。

國內人士對國父的景仰，代表性地提出十二人的看法：戴季陶先生追隨國父二十年，認爲以三句話體認國父的偉大，便是「學不厭，教不倦，行不惑」。學不厭，是求知的努力；教不倦，行不惑，是救國救世的努力，也爲國父意志堅強勇猛精進的精神所在。

吳稚暉先生在講述國父行誼中，提出四項，就是「品格自然偉大，度量自然寬宏，精神自然專一，研究自然精博」；說他是「一個很誠懇、平易近情的紳士。然而只覺是偉大，不能形容的偉大；稱爲自然偉大，最爲適當」。

馬超俊先生，愛以「學問淵博，人格偉大，天下爲公」十二字來形容國父。林森先生說國父是：「意志堅定，不畏艱苦；博大寬厚，親愛精誠；大公無私，不畏權勢；刻苦自制，儉約自奉」。

青年黨人曾琦，認爲國父有不朽的三大特性：「一曰富於革命精神，二曰富於犧牲精神，三曰富於創造精神」；又說：「中山先生非徒爲一黨之領袖，實係全國之導師。」當時的共產黨人，像李大釗坦認國父乃「啓後承先，滌新淘舊，揭民族大義，決然再造乾坤」。譚平山說：「中山一生之事業，爲救國事業。」

陳天華認爲國父廓然大公，不以救國爲已足。他說：「其爲英雄也，決不可以本族限之，實爲世界之大人物；彼之理想，彼之抱負，非徒着眼于本族止也，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，放一大異彩……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。」梁啟超認爲國父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，他最佩服國父的：「第一是意志力堅強；第二是臨事

機警，長于應變；第三是操守廉潔」。于右任先生認爲：「國父偉大的精神，能得到全人類之助力，全民族之擁戴；國父遠大的目光，能可以看到全人類之福利，全世界之隱患；國父廣博的學力，能以集中全人類之智力，而爲新時代之建設，繪出一正確而顯著的藍圖」。

張知本先生說：「第一、國父是千百年難得一遇的偉人，他一身兼孔子、耶穌基督、華盛頓、林肯、唐太宗的長處，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，都願意爲他赴湯蹈火。第二、真正了解東西方文化而又能融會貫通，近百年來，世界上所有偉大政治家，沒有一人能有他那樣淵博的學問。第三、氣度恢宏，平易近人，對任何人都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。」林語堂先生認爲國父具有「古代中國聖哲的求善精神」，又兼備「近代聖哲的求真精神」；所以，有了他，「中國必不亡」；有了他，世界將「進于大同」。國父與世界是分不開的。

中外文庫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